

“让妇好和军队一起去征伐,可以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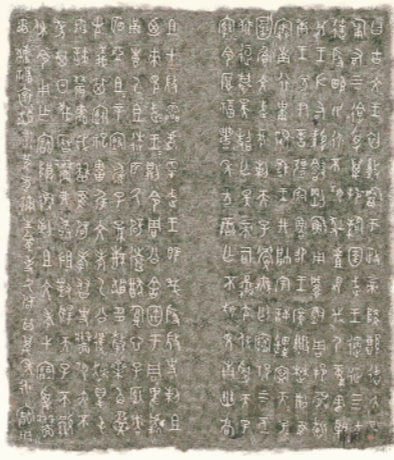
3200多年前,商王武丁命人在龟甲上刻下这个问题,用火灼烧,观察裂纹,试图从神意中寻求答案。妇好的安危,庄稼的收成,远方的灾祸……这些担忧被一笔一画地刻在坚硬的甲骨上,埋入黄土,直到三千多年后重见天日。

知名文史作家孙晓飞所著的《书写中国:从书迹流变溯源中华文明史》一书,正是循着这些刻辞卜骨、青铜铭文和简牍帛书的书写痕迹,试图探寻汉字从实用符号升华为文化载体的演变历程。作者在代后记中坦言,他试着不把本书写成“书法史”,而是写成一本真正的“历史书”。因此,这本书并非我们一贯理解的书法史,它不讲永字八法,不谈神品、逸品,甚至对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的书法技巧也着墨不多——这是一部以笔墨为线索的中华文明演进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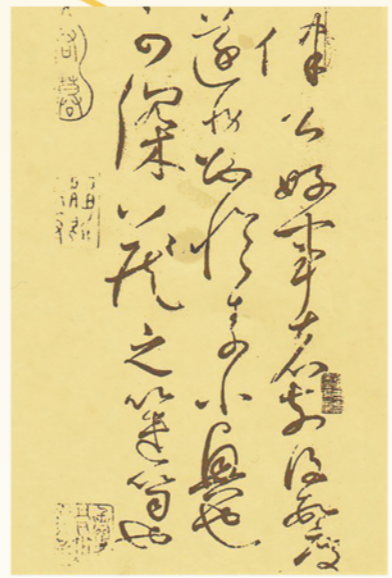
▲“登妇好三千”甲骨卜辞



▲唐代“草圣”怀素《律公帖》



▲西周史墙盘及其铭文拓片



书迹流变里的中华文明史

文字诞生于敬畏

殷墟出土的数十万片甲骨上,展现了汉字最初的形态。那些笔画并非出于审美追求,而是刻刀或锥子在牛骨和龟甲上留下的痕迹。那时候的书写并不是为了让人好看,而是“写下神明的意旨,让世界拥有秩序”。

许多学者倾向认为,中国的文字诞生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,产生动因是占卜。甲骨卜辞通常分为四个部分:叙辞、命辞、占辞和验辞。商王将问题刻在甲骨上,用火灼烧后根据裂纹解读神意,再把结果刻上去。商人几乎无事不卜,因此需要大量语言来表达各种意图。频繁的祭祀活动,众多的先祖名号,以及无数的预测结果,都刺激了词和句子的产生,也推动了造字法和语法的逐步形成。文字的存在,使商王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强化。

甲骨文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。1899年,清代大儒王懿荣生病服药时,发现中药里的“龙骨”上有刻划痕迹。他感到此事非同寻常,便出重金搜求有字龙骨,最多时收藏了一千五百多片。王懿荣去世后,部分甲骨转到清末小说家刘鹗手中。1902年,学者罗振玉在刘鹗家第一次见到甲骨文墨拓片,惊叹“埋藏了三千年的秘密如今被泄露了”。他四处探访,直到1908年才最终确认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。此后数年,罗振玉收藏甲骨三万余片,编印了《殷墟书契》,并开始临写甲骨文字,成为“甲骨四堂”之一。

从甲骨文到金文,文字的神圣性一脉相承。《史墙盘》铭文颂扬周文王:“慈爱惠民的文王,帝神把美好的德灵赋予他,让他远离恶灵,并把上下四方的百姓托他照顾。”文字铸于青铜器内壁,不是为了给人看,而是写给神灵。器物盛放祭品,香气升腾时,文字之意也达于神灵。“书写本身,也因为文字的神圣,而天然地带有某种巨大的力量。”

文字不仅是工具,也是区分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的边界。“所有不接受王朝赠送的用文字书写铭文青铜器器的诸侯国,也不能与王朝用文字共写盟书。文字的神秘力量无法到达的地方,都是夷狄。”文字传播到哪里,文明就延伸到哪里。日本学者白川静研究表,早在殷墟时期,王城内就设置了“学”,方国、邦国和城邑的贵族子弟,都要来此接受教育。西周时,神庙“辟雍”内成立了专门的学宫,“大师教授音乐、诗歌、誓、史等人从之”。通过教育,文字的秘密从王室流向诸侯,从中原流向四方,最终形成了以汉字为纽带的“文化中国”。

从工具到艺术

纸的普及,让书写从神坛来到了人间。人们通常认为是蔡伦改进了造纸工艺,让纸变得容易生产和书写。在此之前,富贵者有时用缙帛书写,那是普通人用不起的奢侈品。汉魏时,蔡邕书名甚高,非白绢不肯下笔。韦诞更是宣称,欲得其书须有张芝笔、左伯纸和他自制的墨。王羲之写《兰亭集序》,也被认为需用蚕茧纸、鼠须笔。

解放书写的同时,纸也在重塑着社会秩序。简牍时代,长短可以区分尊卑;皇帝诏令



《书写中国》

用一尺一寸简,《孝经》用一尺二寸简,而长过皇帝一寸正是昭示着汉朝“以孝治国”。纸张时代,礼制通过颜色体现:皇帝手诏用青纸,朝廷诏书用黄纸,东宫臣僚上疏用白纸,太子回复用青纸。而到了唐朝,规矩变得更加严格:皇帝赐物用白藤纸,抚慰军旅用黄麻纸,道教祭文用青藤纸朱砂书写,将相授官文书用五色背缕金花纸。这与服色别尊卑同理,都是礼仪的显化。

制墨工艺也在此时飞跃。墨中掺胶会让墨迹更易固定,呈现立体感。好墨色如黑漆,光亮鉴人。皇室还会在墨中添加香料,书写因而成为乐事。到了纸的时代,墨摆脱了标示颜色的单一功能,开始承担渲染的艺术使命。笔锋的繁复变化有了施展空间,通过粗细、侧正、轻重,可以呈现出飞白、涨墨等不同的效果。此时,书艺才开始真正萌芽。

此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革力量容易被忽略,即诗歌。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。”曹操的一曲《短歌行》让沉寂数百年的诗坛重新发声,他“亲自把诗行写在纸上,流布四方”。其子曹丕、曹植紧随其后,将诗歌推向新高度,诗人从此成为独立的文化力量。魏晋时代,竹林七贤常聚雅集,诗酒酬唱,赋诗之后,信手而书,传与友朋欣赏。诗歌写在纸上流传,欣赏诗思之美的人们,也顺带欣赏与品评书迹。诗与书,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苏轼对此深有体会。他认为诗是一切表达形式的出发点,只要会写诗,那么书法绘画皆可触类旁通。在宋代,不会写诗的书家只能归于寻常书手。诗境如画,笔意如诗,离开了诗的陶养,书写终究难以脱离工具属性。

书艺背后的权力投影

书艺流变背后自有一套权力逻辑。作者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“书艺政治”的概念,认为推动书艺更新的决定性动力,是政治、社会和文化风潮。

这个概念在“王羲之为何成圣”的问题上体现得非常透彻。我们通常认为王羲之能成为书圣是因为他本身天赋异禀,但作者指出:南朝的皇帝和世家贵族共同选择和塑造了王羲之,才使他成为新一代“圣人”。门阀政治催生门阀文化,世家大族的审美成为社会风向标。当行止、谈吐、服饰等元素已经无法区分阶层的时候,书艺便成了新的文化门槛。在魏晋南北朝,能写一手好字,才配进入特定圈子。其后的漫长历史中,阶层的区分不用财富术语,而是文化用语,比如雅俗。

但雅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在苏东坡时代被视为俗气匠人的界画,今天却成为故宫镇馆之宝;扬州八怪在如今看来是雅艺,在清中期却被视为低俗的盐商艺术。

在宋代,唐代忠臣颜真卿被推为新的文化英雄。欧阳修称其书迹“如忠臣烈士,道德君子”,将个人道德与书迹捆绑,人正书亦工,人不正则书不入上品。苏轼继承了这一点,认为论书兼论其平生,苟非其人,虽工不贵。

这也解释了蔡京虽然书法精妙,却被踢出“北宋四家”的原因——政治正确压倒了艺术评判。书法史上素有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的说法,有争议的一点是,“蔡”原可能指蔡京,但靖康之变后,蔡京被视为大奸臣,人奸书亦坏,蔡襄遂取而代之。可以看出,权力的评判改写了艺术史的书写。

三次怪奇浪潮

在梳理数千年书艺流变时,作者发现,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“怪奇浪潮”。第一次在魏晋,王羲之、王献之打破了汉隶的平正规范,今草、行书等书体应运而生。第二次在晚唐,社会“追奇逐异”的风气催生了“草书僧”现象,“行为怪狂、书写癫狂、草书放任”。第三次在晚明,王铎创造的涨墨法,不拘于传统,重视心灵的飞舞和个人风格的创造。

三次浪潮共同印证着,书风的改变其实是时代的改变。社会秩序稳定时,书风趋于平正;社会动荡变革时,书风则走向狂放。笔墨之间,藏着时代更迭。

以宋代为例,人们通常以“尚意”概括其特征,正如苏轼那句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。但这需要放在更大的语境中理解。宋代的价值观总体偏向保守,书艺同样呈现保守趋势。欧阳修、范仲淹、韩琦等人的书迹“呈现趋同的面貌,难以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”。科举的大规模推行使皇帝对士人的控制空前强化,知识分子被驯化,主动站在皇家立场发言。向内要求道德自省,向外追求文化慕庸,两者结合,共同压制着文化创新。而晚明的“狂怪”则是另一种情形。王铎后来成为“贰臣”,却也因此挣脱了某些束缚,在书艺上达到新的高度。历史总是这样:政治上的失意,有时反而会成就艺术的丰盛。

读罢全书,就会意识到书迹流变的背后其实是文脉延续。为何古埃及的圣书字、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都成了“死文字”,唯独汉字时至今日仍然生机勃勃?

汉字从诞生之初就不只是记录工具——甲骨文沟通人神,金文祭告先祖,简牍承载行政,纸张传递诗情。它还承载着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。从神秘先秦,端庄两汉到狂放三国两晋,从风流南北朝,辉煌大唐到儒雅两宋,从煌煌大元,怪奇明朝再到守成之清,书迹流变史,就是一部中华文明的韧性生长史。每一次笔锋的提按转折,都是古老文明在面对新挑战时做出的应变。载体在变,笔法在变,风潮在变,但那条贯穿三千年的脉络从未中断,并将继续延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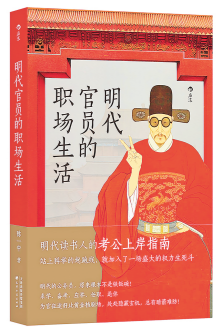
相关阅读:

- 1. 沃兴华:《中国书法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
- 2. 蒋勋:《汉字书法之美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
- 3. 朱凤瀚:《甲骨与青铜的王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
- 4. 方建勋:《中国书法十五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

书单

《明代官员的职场生活》

陈一中 著
后浪/天津古籍出版社
步入明代,科举制度走向鼎盛,科举考试也逐渐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门道和讲究。对此时的许多读书人而言,入朝为官可以说是一生的事业追求。而真正进入官场后,更是容不得半点松懈:如何小心翼翼地侍奉皇帝,如何与同僚及宦官集团共处,如何在各色纠葛中保全自己,都是京官不可不学的求生之道。从求学、备考、应举、任职至退休,明代官员的职场生活可谓环环皆有讲究。一旦踏入其中,便注定要尝尽酸甜苦辣。本书正是聚焦这些于明代官场中挣扎沉浮的文人,从他们的奇闻趣事,生存智慧入手,深入剖析明代官场与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,展现一场精彩的明代仕宦之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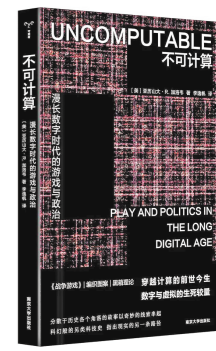
《〈山海经〉的博物世界:植物》

贾雯鹤 著
四川人民出版社
作者师从中国神话学大师、《山海经》研究第一人袁珂先生,潜心《山海经》、中国神话研究志业三十余载写就此书。本书从博物学视角审视了《山海经》的上古草木,对其起源、命名与特征加以史料追溯与专业解读;查阅海内外现存古卷,择近600幅罕见草木手绘插图,修复并还原了典籍古卷中的图像实录;基于史料实证,旁征博引,图文互补,生动展示了《山海经》中各种植物的形态、特征及实用价值,堪称一部神秘朴拙的上古草木博物志。



《不可计算:漫长数字时代的游戏与政治》

[美]亚历山大·R·加洛韦 李逸帆 译
南京大学出版社
作者穿越计算历史中的不可计算遗迹,讲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计算与数字媒介历史事件,展现了计算兴起于世的成与败。聚焦于“可计算”与“不可计算”,解释了计算如何产生或无法产生。从手工纺织机编织的复杂图案,到可计算生物体,再到《战争游戏》与箱箧理论,作者锚定了计算历史中的一些关键节点,解释了某些看似过时的技术的深远影响。



我与书的故事

泥土里长出诗行

□ 赵吉成

1978年春天,我在高余书店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,我让服务员递过来。看了看,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临潼县文化馆胡采同志编写,郭沫若同志题写书名的《王老九诗选》。我毫不犹豫地掏钱,把这本只有155页的小书捧回了家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,这次相遇将如何深刻地改变我的生活。

王老九同志是陕西的农民诗人。他一生经历了两种社会——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,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。他把旧社会的生活比作“阴山底下压”,把新社会比作“蜜罐子”。他的诗一方面是对旧社会和反动派的诅咒和痛恨,更多的是对党以及新社会的热情歌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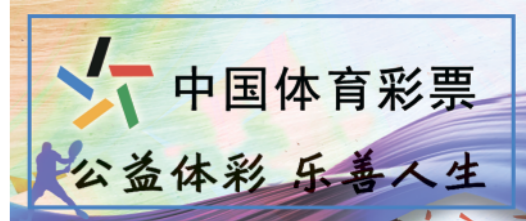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体会最深的是歌颂三户贫农响应号召办农业社的诗。他这样写道:“这个好比一棵灵芝草,出头露面苗苗小;毛主席担水及时浇,一夜长得比山高。”写合作化运动:“单干好比独木桥,走一步摇三摇。”他还写了很多歌颂共产党和新社会的优秀诗篇,如《想起毛主席》《伟大的手》《进北京》等。

王老九的诗句透着真挚、语言淳朴,比喻得当,生动形象,每首诗都透着浓厚的乡土气息,我深受感染和启发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学着用诗和顺口溜的方式记录我所在的小山村的变化。

2009年村里通了沥青路,我看着压路机轰隆隆地开过,黑亮的柏油路直通家门口,我激动得两眼含泪。想起从前去趟济南,要么夜里两点钟起床,步行三十里到孔村乘车,要么只能坐拖拉机去平阴赶班车。如今村里也开通了公共汽车,我感慨万千,写下了“沥青路铺进村,又平又宽真带劲;从前坐车去平阴转孔村,如今乘车在家门。”我把它寄到《济南日报》社,报社编辑竟以我的“顺口溜”为题登在报纸上,还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中获得了奖励。

没过几年,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。记得当时村东边王大爷爷家安上了村里第一部电话。那天他家里来了不少人,都想看看小盒子里如何能传出远方亲人的声音。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,又一次感慨家乡的新发展。回家后,我就写出了“有人在外牵牵挂,家家都已安电话;若要有事摁号码,天南地北把话拉。”就这样,我一写就是40多年。俺村有个文艺宣传队,我编写的诗、顺口溜等文艺作品在宣传队演出后,得到了村民的好评,有少部分还被《济南日报》《农村大众报》及其他文艺刊物刊登。如今,这本《王老九诗选》的扉页已泛黄发脆,但那些诗却依然鲜活如初。感谢王老九,他不仅指导我写诗写顺口溜的方法,还让我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,有了一颗感受时代脉搏的心,让我明白自己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都可以写成诗和其他文艺作品。泥土里长出的诗行,最是芬芳。感谢与《王老九诗选》这本小册子的相遇,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也能用朴实的语言记录家乡的变迁,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?请用千字左右,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知的故事。欢迎来稿。
投稿邮箱:dazhongribawt@163.com



从“宅兹中国”看何以中国

现的最早的“中国”两字。

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唯王既克大邑商,则廷告于天,曰:余其宅兹中国,自之乂民。”大意是说,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王都后,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:我现在在中国安家(建都)了,统治民众。显然,“中国”就是指周武王的王都。

为什么周武王的王都可以称为“中国”呢?这还得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说起。

夏朝建立后,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,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,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。

这些都邑和聚邑,被称为“国”(“國”)。是一个象形字,中间的“口”代表人、人群,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。由于这片土地是这群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,必须有人拿着戈守卫着。为安全起见,周围还要建一圈墙——外面的一个大“口”。何尊中那个“國”字的写法还没有外面这个大“口”。这样的国当时已有很多,所以有了“万国”的说法。“万”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,而是一个形容词,“万国”形容国之多。

盘庚迁殷后的二百多年间,商朝的首都一直在殷(今河南安阳殷都区)。殷虽然也是“万国”之一,但其地位与重要性已远在其他任何

国之上,因而被称为“中国”。“中”本来是商人制作的一面特殊的大旗的名称,用作集合部众。每次召集时部众都会围绕聚集在这面大旗“中”的周围,时间久了,“中”就衍生出“中心”“中央”“最重要”等含义。中国,就是万国的中心、中央,万国中最重要的一个国,也就是何尊铭文中的“大邑商”。直到东周初,“中国”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,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“都”。

进入春秋时代,“中国”早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,诸侯国,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,都拥有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作“中国”。“中国”还被称为“赤县神州”,或称为“神州”。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,实现统一,他的首都咸阳当然稳居“中国”的地位,而六国的首都和疆域也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,各自的“中国”概念也得以延续,所以整个秦始皇的统治区都成了“中国”。

但秦朝的存在时间太短,这个“中国”概念尚未普及,在西汉前期还与传统的、狭义的“中国”概念并存。狭义的“中国”相当于中原地区。一方面,“中国”就是汉朝的代名词,尤其是对外而言,如在汉宣帝议定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朝见仪式时,萧望之提出的原则是“使于中国不为叛臣”。另一方面,在汉朝内部,“中国”的定义还不一致,如对边疆新设置郡县的地

区,当地民众已经认同中国,但此前已经设置郡县内的民众还不将这些地方当作中国。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部落聚居区,也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。

此后建立的中原王朝,东汉、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无不以中国自称,无不以中国为本朝国号的代名词。无论朝代如何更迭,皇帝如何易姓,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,从未间断。

清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,清朝平定天山南北,实现了空前的统一,但清朝的国号、正式名称还是“大清”“大清国”,清朝与外国签订的条约,除《尼布楚条约》因没有中文文本(是满、俄、拉丁三种文本)而使用“中国”一词外,其他全部称“大清国”。“中国”一词还有两种用法,有时指清朝全部疆域,有时仅指直隶、江苏、安徽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十八省,而不包括满洲(东北)、新疆、乌里雅苏台(今蒙古国古代,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中国新疆各一小部分地区)、青海、西藏等。

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,在多数场合即称“中国”。从此,“中国”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,其空间范围覆盖我国的全部领土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“中国”作为国号和国名的概念和涵义延续至今。

(摘自《何以中国》代前言,刊发时有删节)



□ 葛剑雄

1963年8月,陕西省宝鸡县(今宝鸡市陈仓区)东北郊贾村出土一件青铜器,后被命名为“何尊”。1975年,考古学家发现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,其中有“宅兹中国”一句。何尊铸造于周成王初年,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,距今已有三千余年,这是迄今为止发